

张玉胜 著

岱廟碑刻

山東畫報出版社

引 言

古人云：“山莫大于泰山，史亦莫古于泰山。”这里的“大”字，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泰山的雄伟气势，二是指泰山在人们心中的崇高地位。这里的“古”字，同样也有两个方面的意思，那就是泰山悠久的历史和璀璨的文化。而泰山碑刻，则将上述内涵融为一体，成为泰山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山脚下的岱庙到泰山极顶，山路的沿途布满了历代碑碣刻石，计有 1300 余处，其内容涉及帝王封禅告祭、文人题诗吟岱、庙宇创建重修等方面。就其书体而言，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佳作迭出。这些碑刻，或佐证历史，或点景抒情，或寓理成趣，丰富了泰山文化的内涵，形成了一座天然的中国历代书法博物馆。

岱庙是泰山历代碑刻较为集中的地方。现有碑刻 300 余通，碑碣林立，形制各异。其书体流派纷呈；其内容丰富多彩。漫步其间，既

可得书法之趣妙，又可览历史之变迁。

本书试图就岱庙主要碑刻的文字内容、书法及其历史文化价值作出阐述，愿它能为您浏览岱庙、赏析碑刻提供一点方便。

目 录

引言	1
卓绝千载——名碑名品	1
秦泰山刻石	1
汉衡方碑、张迁碑	5
唐双束碑	9
法古事礼——封号祭祀碑	13
大宋封祀坛颂碑	13
大宋东岳天齐仁圣帝碑	17
去东岳封号碑	20
明洪武祭祀碑	22
言志篇章——颂岱题名碑	25
张衡、曹植诗文碑	25
陆机、谢灵运诗文碑	27
孙璋登泰山诗文碑	29
张佳胤登岱四首碑	30

观海碑	31
大观峰碑	32
潘鉴登泰山诗碑	32
登泰观海碑	33
张鹏翮汉柏、唐槐诗碑	34
秋兴八首诗碑	35
清定亲王诗碑	38
朱德诗碑	41
郭沫若题句碑	42
“天子”风骚——乾隆御制诗碑	45
奉皇太后登岱而赋	45
谒岱庙	46
题唐槐	49
登岱二首	50
过泰山再依皇祖诗韵	50
过泰山三依皇祖诗韵	51
题环咏亭	53
题登封台	53
题朝阳洞	54
题壶天阁	54
题桃花峪	55
岱庙沧桑——创建重修碑	57
大宋天贶殿碑铭	57

宣和重修泰岳庙记碑	61
大金重修东岳庙之碑	64
东岳泰山之神庙重修碑	66
重修东岳庙记	69
乾隆重修岱庙记碑	71
重修遥参亭碑记	74

图版目录

1. 秦泰山刻石——	3
2. 汉衡方碑——	6
3. 汉张迁碑——	7
4. 唐双束碑——	10
5. 大宋封祀坛颂碑——	14
6. 大宋东岳天齐仁圣帝碑——	18
7. 明洪武祭祀碑——	23
8. 张衡、曹植诗文碑——	26
9. 陆机、谢灵运诗文碑——	28
10. 登泰观海碑——	33
11. 秋兴八首诗碑（局部）——	35
12. 清定亲王诗碑——	39
13. 朱德诗碑——	41
14. 郭沫若题句碑——	43
15. 乾隆谒岱庙诗碑——	47
16. 大宋天贶殿碑铭——	56
17. 宣和重修泰岳庙记——	62
18. 大金重修东岳庙之碑——	65
19. 乾隆重修岱庙记碑——	72

秦泰山刻石

据史书记载，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多次巡幸全国，所立刻石凡七种，即《峄山》、《泰山》、《琅琊》、《东观》、《芝罘》、《碣石》、《会稽》。据查，现仅存《泰山》、《琅琊》二石。

秦《泰山刻石》又称《李斯小篆碑》，是泰山现存最早的碑刻。该碑于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立于岱顶。石分四面，三面为始皇帝刻辞；一面为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诏书刻辞；累计刻222字。秦刻石自诞生至今，已经历了两千多年的沧桑变化。北宋徽宗时期，秦刻石已大部分磨失，可识者仅存

146字；其明代以后又几移地址，数遭磨难，至明嘉靖年间减至29字，移至岱顶碧霞祠东庑；清乾隆五年（1740年）毁于火灾；清嘉庆二十年春（1815）泰安知县汪汝弼、蒋伯生等在碧霞元君祠西侧玉女池内缒井觅得两块石碑残石，残石尚存二世诏书10个残字，即：斯、臣、去、疾、昧、死、臣、请、矣、臣，（图1）有关人员将其嵌于岱顶大观峰前东岳庙西新筑的“宝斯亭”（又名读碑亭）内。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东岳庙西墙倒塌，宝斯亭被乱石覆盖，后泰安县令徐宗干在瓦砾中又寻得残石，移其至山下，嵌于岱庙道院壁间。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刻石被盗，当时泰安县令毛蜀云大力稽查，最后在泰城北关石桥下发现，复安置岱庙；宣统二年（1910年），泰安知县俞庆澜又在岱庙西侧建石屋保护之；1928年，又将其移岱庙东御座内，就地建亭保护至今。秦《泰山刻石》，虽历尽劫难，但一直为世人所重视。清代王家榕赞曰：“零星两片石，卓越两千年。”

秦《泰山刻石》是我们研究秦代历史和文字的珍贵资料。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的政策，“罢其



图1 秦泰山刻石 秦二世诏书部分，今残存10字。即：斯、臣、去、疾、昧、死、臣、请、矣、臣。

不与秦文合者”，秦刻石为“书同文”提供了标准字体即作为通行全国书体的小篆，它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的文字混乱状况，为汉民族文字的统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秦《泰山刻石》具有较高的书法艺术价值。李斯是我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位书法家，善大篆，在大篆的基础上改省结体，整齐笔画，成为小篆的主要创始人。泰山刻石即为李斯的代表作之一，代表了秦篆的最高水平，历代文人均给以较高的评价。宋刘跋《秦篆·谱序》云：“李斯小篆，古今所师。”《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说：“始皇勒岳，政暴而文泽。”元朝郝经在其《太平顶读秦碑》中赞道：“拳如钗骨直如筋，屈铁碾玉秀且奇，千年瘦劲益飞动，回视诸家肥更痴。”明赵宦光评曰：“斯为古今宗匠，一点矩度不苟，聿遵聿转，冠冕浑成。藏妍婧于朴茂，寄权巧于端庄。乍密乍疏，或隐或显，负抱向背，俯仰承乘，任其所之，莫不中律。书法至此，无以加矣。”明代《岱史》中一面说“秦虽无道”，一面又赞“然其所立有绝人者，其文字、书法世皆莫及”。我国当代文学巨匠鲁迅对秦刻石也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秦刻石“质而能壮，实汉晋碑铭所从出也”。的确，小篆字体整齐秀美、笔画简易，顺应了文字的发展，加上李斯高超的书法造诣，这使泰山刻石的书法艺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浑厚、平稳、字形工整、线条

柔润、结构左右对称，上承大篆遗风，下拓汉隶先河，不愧为小篆典范，书法瑰宝。

汉衡方碑、张迁碑

《衡方碑》全称《汉故卫尉卿衡府君之碑》。立于东汉灵帝建宁元年（168年），碑原在汶上县西南郭家楼村，1953年移岱庙保存，现陈列于岱庙东碑廊，碑高2.40米，宽1.10米，碑首为圆形，额下有穿（碑刻上方圆孔，曰穿），长方形碑座。衡方，字兴祖，东平陆县（今汶上县）人。步入仕途后，因政绩显著，入朝升任卫尉之职。灵帝建宁元年，召用旧臣，任命为步兵校尉，统六军之帅，督守边疆，不久因病而卒，享年63岁。该碑为衡方的门生朱登等为其所立颂德碑。（图2）

《张迁碑》全称《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立于东汉灵帝中平三年（186年），碑原在东平儒学明伦堂前，1965年移岱庙保存，现陈列于岱庙东碑廊。该碑高2.92米，宽1.07米，碑首为圆形，长方形碑座，碑周边有蟠螭浮雕盘环（图3）。张迁，字公方，陈留己吾人（今河南省夏邑县）。碑文着重颂扬的张迁的祖先，有汉高祖时期的张良，汉文景



图2 汉衡方碑 全称《汉故卫尉卿衡府君之碑》
碑圆首有穿，部分风化较甚，上部刻有清光绪建
碑亭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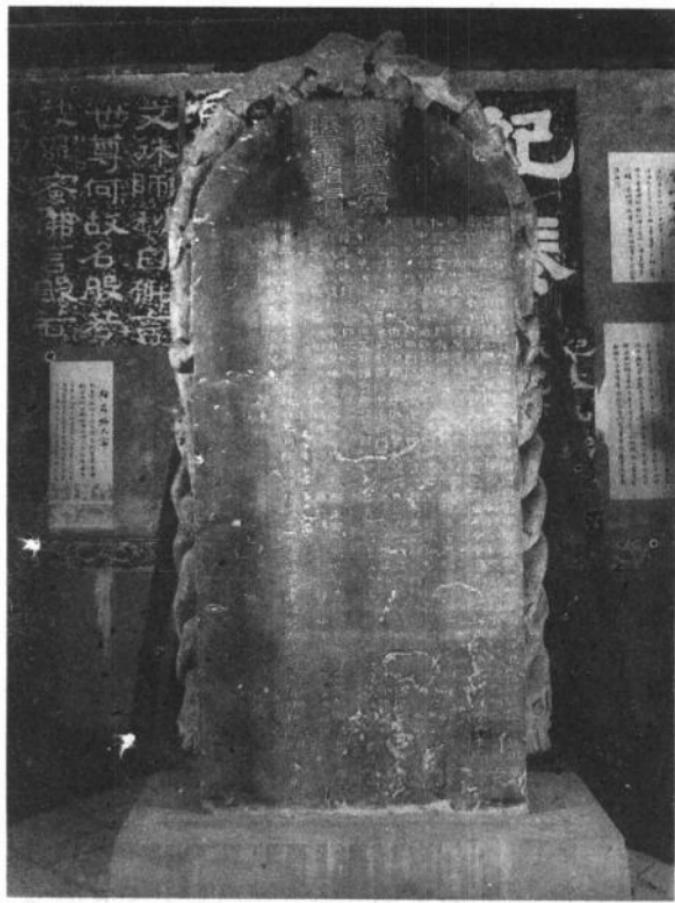


图3 汉张迁碑 全称《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碑方座圆首，周边饰有蟠螭盘环浮雕。

时期的张释之以及汉武帝时出使西域的张骞，同时又歌颂了张迁本人在任谷城长时的政绩，有“路无拾遗，犁种宿墅”的赞语。碑文还特别颂扬了张迁在抵抗黄巾农民起义中的赫赫战

功：“黄巾初起，烧平城市，斯县独全。”张迁因此由谷城令升任荡阴令，该碑即张迁在谷城的旧吏韦萌等41人捐资，为表彰张迁的功绩所立。

《张迁碑》较《衡方碑》晚18年，两碑均为歌颂“功德”，但他们的书法艺术都很精湛，各有独到之处。《衡方碑》的书法以体丰骨壮而著称，笔画端正，折角敦方，顿挫分明，应规入矩，被公认为汉隶方整类的典型作品，其用笔大都以圆笔为主。方家归纳其笔法有以下三个特点：一，间架特别稳重，字字如千斤磐石，蹲踞其位，仪态敦厚；二，以粗壮、古拙之行笔，造成一些部首绝对方整的形象；三，运用收笔时重顿的笔法来配合造型的淳朴，显出独特的风格。《张迁碑》字体端直朴茂，雄强遒劲，自明代出土以来，便被奉为珍品，成为书法爱好者临摹的范本。后世对其书法有“枯老古拙，如龟如鳖，重浊轻清，斩钉截铁，蚕不并头，雁不双设，外方内圆，内捩外拓”的评语。其用笔特点，以方笔为主，字画二分，书稍壮，形状龙威虎震，剑拔弩张，表现的气势万钧。值的指出的是，《张迁碑》的额为篆书，一般篆书书体瘦长，唯此扁平，独具风

格。

隶书是汉代书法艺术的突出成就，字体的肥瘦大小，结体运笔，变化无穷，各尽其妙，在书法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它上承前代篆书的一些规则，下启魏晋、南北朝、隋唐楷书的风范，作为汉隶的典型作品，《衡方碑》、《张迁碑》实为我国书法艺术的宝贵遗产。

唐双束碑

唐《双束碑》全称《岱庙观造像记碑》，因碑身双束并立，又俗称《鸳鸯碑》。双束碑身高 2.36 米，宽 0.50 米，碑身三面环刻，书体均为楷书，立于唐高宗显庆六年（661 年）。（图 4）

该碑内容为唐 6 帝 1 后在泰山斋醮造像活动的记录。撰文者和书写者皆不出自名家之手，但碑的形制造形，独具特色，有着深刻的政治寓意。双碑石嵌入同一碑座和碑首之中，碑首为九脊歇山顶状，雕刻极为精细，有部分饰件遗失，碑座为长方形。碑首代表天，碑座代表地，双碑代表高宗李治和武后则天，寓意二人共同治理天下。这与当时的历史背景相吻合。武则天，14 岁入宫为李世民的才人，太



图 4 唐双束碑 全称《岱岳观造像记碑》，是泰山最早的唐代碑刻。碑身双束嵌入同一碑座和碑首之中，俗称鸳鸯碑。

宗死后，削发为尼，30岁时被高宗李治召为昭仪，永徽六年（655年）被册封为皇后，从此涉足朝纲。据史书记载：“百事奏事，上或使皇后决之。后性明敏，涉猎文史，处事皆称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权与人主侔（相等意）矣。”双束碑立于武则天初摄朝政，与高宗共